

一、国歌创作原型源于辽宁的主要依据

辽宁义勇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时间自发而起,迅速壮大,是东北义勇军的发端和主体。因为辽宁处于战祸的最前沿,所以辽宁义勇军的斗争最早兴起,遍及辽南、辽东和辽北广大地区,高峰时期达到58路,人数达三四十万,占东北义勇军的三分之二强,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抵抗和频繁打击。1931年至1933年是辽宁义勇军集中抵御日寇的时期,这段时间也正是电影《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积累素材的阶段。无论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还是作曲的角度,田汉和聂耳都从辽宁义勇军身上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可以说,辽宁义勇军为《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源泉。

1. 辽西义勇军的誓词、军威和战绩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1931年9月27日,辽西地区高鹏振率众竖起“镇北军”大旗,抗日救国,10月10日,组建“东北国民救国军”。赵扶民老人是长期研究义勇军史的作家,他在亲身走访的过程中,接触到义勇军老战士王恩、王玉楼等人,他们深深地记得老梯义勇军的军歌:“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破)碎,家园(被)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一杀一杀,——二——三——四!”老战士回忆说:“每当有人加入队伍时,先在关老爷像前由干部领着读誓词,不单这几句,挺长的,然后就学唱,在出操时唱,休息时也唱。”义勇军的誓词鼓舞人心,很多人听说打日本,都纷纷加入镇北军。1932年1月,高鹏振亲率“救国军”取得“五台子大捷”,战绩辉煌。“谍报双星”之一的王立川把它写入《血战归来》,刊登在了《新中华》1932年1卷第9期上,文章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抗日激情。“老梯子”威震敌胆。日本《协和》杂志惊呼:“辽西抗日义勇军是和七百年前成吉思汗的名字一起,以剽悍、敏捷、勇猛而震动全世界的了不起的民族。”高鹏振率领的辽西骑兵支队,被誉为“义勇铁骑”,六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型战斗一百多次。报刊上连续刊载辽西义勇军参加锦州保卫战、热河保卫战以及长城抗战的战绩,使田汉大受鼓舞,他在1933年写道:“最后的胜利是不决定在敌人的武器而决定在全国劳苦民众的意志。但凡他们不肯做奴隶,他们是必能把帝国主义强盗踢出去的,不管它的飞机大炮是多么厉害。因此只有组织了自己的力量,才是真正能防卫自己的家的万里长城。”^[143]

2009年5月16日 CCTV-10 频道探

索·发现播出《关东军极密档案(上)——迷雾重重》,军事专家解说道:“据说田汉先生看到《血战归来》,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场写下了《抗日义勇军进行曲》著名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种说法在时间上不足为信,但是田汉作为爱国作家、共产党员,在民族危亡关头定然会密切关注抗战形势,也定然会受到辽西“老梯”义勇军军歌和战绩的鼓舞,影响到他的创作。透过上述“誓词”与国歌的比较,不能排除高鹏振的“抗日誓词”是国歌的创作源头之一。

2. 辽南义勇军《宣言》、《通电》为《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精神给养。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盘山人张海天、项青山等在沙岭拉起了最早的抗日武装“讨日



扶民救国军”并于9月23日袭击了当时日人占领的营口水源地和发电所,打响了民众抗战的第一枪。这是东北民众在九一八事变后最早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显示了蕴藏在民众中的力量。11月又取得了剿灭汉奸凌印清并击毙日本参谋仓冈繁太郎的重大胜利,张海天(“老北风”)名震东北。由于盘山义勇军兴起之早、影响之大,黄显声把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三路总指挥授予张海天、项青山、盖中华。辽南地区义勇军连绵而起,正是民族长城的写照。1931年底,盘山义勇军代表东北义勇军最早向全国发表《宣言》和《通电》,称“决不甘当亡国奴,为自卫而死,为国家而死,为民族生存而死,死有余荣”,“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宣言》和《通电》表明义勇军的斗争正在由感性的反抗而上升到理性的精神追求,在民族危急关头奋起自救的决心和勇气跃然出现。

日伪报纸《盛京时报》连篇累牍地报道盘山义勇军的战况,“老北风”的名字频频上报。仅1931年10月至12月间,《盛京时报》关于老北风张海天的消息就有二十余条。这些业绩不可能不进入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视线,并且推动他们的创作。而且《宣言》和

《通电》与国歌在境界上异曲同工。

3. 辽东“血盟救国军”军歌为《义勇军进行曲》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原创素材。1931年10月,辽宁抚顺清原满族自治县成立抗日武装“血盟救国军”,爱国志士孙铭武、张显铭等人举起抗日大旗,对天盟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抗日救国,杀身成仁”,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血盟军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辽东地区抗日劲旅。就是在这支队伍当中,诞生了我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这首军歌被广泛传

唱,而田汉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时刻关注国家命运和抗战情形,他极有可能非常熟悉这首军歌!否则《义勇军进行曲》怎会与之如此相似!而且唐聚五将军作为辽东地区一个著名的义勇军将领,定然会熟知这首军歌!1934年,唐聚五到武汉向张学良汇报工作期间,接受《抗战日报》主编田汉的采访,

田汉正在收集各种关于义勇军的创作素材,以一个记者的敏感度也势必会挖掘到这首军歌。这年冬天,田汉即完成了以古北口保卫战为背景的《凤凰涅槃》故事梗概,并创作了主题《军歌》,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144]

随后夏衍把《凤凰涅槃》改写成电影剧本,名为《风云儿女》。得知这首歌词后,青年音乐家聂耳主动要求为之谱曲。积累于内心当中的情感蓬勃而出,他把词稍作调整,融合在磅礴的旋律之中,终于铸就了《义勇军进行曲》不朽的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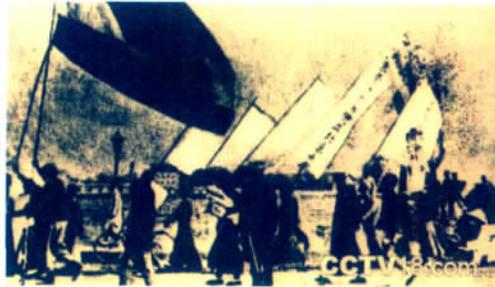
4. 聂耳等进步文艺工作者亲临热河抗战前线,获得了对于辽宁义勇军血肉筑长城壮举的感性认识。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占领了山海关,面对华北的危急,北平地下党指示中共特别党员刘澜波(黄显声秘书),通过北平“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把在辽西和辽南的义勇军派往热河前线,被编入第2军

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自身力量极其孱弱,亦缺乏现代外交知识,对民众排货行动基本未能运用。自民国以降,历届政权或多或少均将排货运动视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武器之一,在外交博弈中予以充分运用。

袁世凯政府一度容忍民众进行排货运动,交涉谈判中亦以舆情压力为由应付日方,甚至违背“严守秘密”的承诺而大肆运用新闻策略,故意将“二十一条”内容及中日交涉问题泄露于中外媒体,以期获得西方各国的介入和支持。当中国舆论一致抗议日本无理要求时,政府并未对报章杂志加以严格管制和压抑。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曾经要求中国对新闻舆论加以审查管制,日置益亦曾向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抗议中国政府一反传统习惯,不仅对报界言论不加管制,反而更利用舆论来帮助中国谈判。陆征祥答称:“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此一似是而非的说辞,并非说明袁世凯政权已经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而是表明中方谈判策略在于暂时争取民众的支持。事实上,中国政府亦正式承认采取此种政策,袁世凯曾说:“凡属中国能够让步者,均已作了让步。但虑及中国主权和与其他外国条约之关系以及国内舆论

沸腾等,终不能再作更多之让步。”袁世凯所发排货运动禁令的有关措辞,一是对民众的爱国情感始终有所肯定。5月26日的禁令声称,各处函电“语多激烈,其出自公义者,固不乏人,亦有未悉实情,故为高论,置利害轻重于不顾,言虽未当心尚可原。”6月29日的禁令虽然强调中央迭降明令,而“抵制余波仍未尽息”,但依然承认抵制日货者“各具爱国之诚”。二是对普通民众与所谓的“乱党”区别对待,对民众的排货行动“剴切谕禁”、“设法开导”,对于后者则“严拿惩办”。

五四期间,运用排货行动促使日方让步的思路更加清晰。五四排货运动初起时,官方之所以“不予强力禁阻,而任其燎原”原因之一在于,排货运动旨在反对日本侵害中国之主权,官方面对日本步步进逼,“颇思借民间反日情绪,作为对日外交之后盾”,故而对学牛排货运动“隐予放任”^[1]。1919年12月17日,日本小幡公使将日本政府关于福州事件之训令面交外交部次长陈篆,陈声称:“现时国家外交,不得专恃政府,尤注重国民外交。欲求两国亲善,必须两国国民感情日笃,方可达到目的。排货等事,推究其原因,皆由日本国民所主动,中国国民实居于被动或反动地位。



抵制日货与弱国外交

□ 杨棉月

然关系感情之事,又非政府所能压制,政府亦无可奈何。故余甚望此次福州案件,贵国能有何种表示,以慰中国之人心,补救两国国民之感情,其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乃自本案发生以来,政府方面办理亦觉困难,如派舰一事,中国民心极为不平,余屡次商请撤舰,而贵国终不见听。”小幡回应说:“阁下屡以撤舰为言,是否撤舰后即易于镇压风潮?”陈则直言:“福州事件发生,人民已愤不能平,及见泊舰于港内多日不归,不平更甚。贵国如能撤退军舰,人民不平之心稍平,一切自必稍易办理。”^[2]

团。这时北平地下党也将在辽西和辽南地区分别由共产党员王北成和白乙化领导的部队编进了2军团骑兵团。辽西义勇军将领刘凤梧回忆录《回忆黑山县抗日义勇军》中记载:“1933年2月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来到热河,他们一边慰劳义勇军,一边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拍摄的电影《长城抗战》记录了我们骑兵团很多活动情况。”^[3]

当时,北平抗日救国会张希尧还派高鹏、崔勇、魏甲山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到了热河进行宣传,当时他们喊得最响亮的一句口号是:“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后来,聂耳在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为了合旋律,也为了更深刻,他就把它改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4]

聂耳在热河亲眼看见辽宁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场面,感受着义勇军血肉筑长城的精神,这些都为他后来给《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奠定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使《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慷慨激昂,铿锵有力。

二、弘扬“辽宁是国歌发源地”的重要意义

1.是对辽宁义勇军历史的高度肯定。辽宁义勇军活动的时间比较短,头绪多,他们

大多自发而起,没有装备,缺乏组织,却能够在中华民族最危亡的时刻以血肉之躯和顽强意志对抗侵略者的铁蹄。他们的抗战是东北14年不屈不挠抗战史的发端,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乃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先导,辽宁义勇军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挖掘国歌的发源,实际是对辽宁义勇军历史的再现和肯定。

2.是对辽宁独有的历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辽宁义勇军作为辽宁历史的一个片断,能够成为国家解放和民族复兴漫长历史进程中一个精神号角的重要渊源,这是辽宁的骄傲,是辽宁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和有效利用。

3.是辽宁人民精神面貌的高度体现。国歌以寥寥数语刻画辽宁民众国难当头之际揭竿而起的气魄以及辽宁义勇军“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决心,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坦荡品格。国歌恢弘的旋律凝聚了义勇军的魂,展示了优秀辽宁儿女信义、勇毅、忠义的品质。“宁为义勇死,节烈永芬芳”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有理由成为辽宁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品牌。

4.有利于提升地区影响力和凝聚力。国歌的创作沃土在辽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得以高度凝练的源头在辽宁。在国歌的旋律中积淀和弘扬辽宁的文化底蕴,必将扩大辽宁在全国的辐射力和感召力,提升辽宁人的自豪感和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这也是增强辽宁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最好广告。

但是,涉及国歌的发源,终究是个严肃的命题,需要更加谨慎的定位。我们希望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国歌的发源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强行据为己有,更不可把本属于辽宁的历史资源漠然处之。有句话说:“唯有能战、善战、敢战者,方能止战。”辽宁义勇军虽然限于客观条件,无法止战,但它却唤起更大范围的能战、善战、敢战的力量,最终把侵略势力送上了审判台。周恩来:“海可枯,石可烂,义勇军的民族大义,是永远不会磨灭的。”^[5]辽宁义勇军的民族大义凝结在国歌的旋律中,传唱不衰。

参考文献

- [1]董健.田汉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
[2]田汉.田汉文集第11卷[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3]黑山县文史资料第五集. [4]辽宁党史资料通讯,1984(7). [5]新华日报[N].1941-9-18.
★作者简介:张洁,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卢骅,辽宁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